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十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四期 ——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0 1 2 b）

【史海钩沉】《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何 蜀
【往事追忆】我的造反生涯	徐友渔
【研究评论】徐友渔的红卫兵研究	王鹏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 何 蜀 •

1967年2月中旬，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因“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而神州大乱，各类矛盾空前激化之际，一则引起广泛注意的消息从重庆传向全国各地：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作家罗广斌“自杀”……

在中国大陆，从60年代生活过来的老、中、青、少各年龄、各阶层的人们，几乎无不熟悉《红岩》这部小说，无不熟悉罗广斌这个名字。因此这个消息震动了许多人的心。当年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领袖、“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我不忏悔》一文中就写到，他于1967年春因炮打张春桥受到批判后外出串联归来，“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5分钟，其中3分钟是请大学起立为罗广斌默哀。”由此可见罗广斌之死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提到作家在“文革”中的自杀，人们会想起杂文家邓拓、翻译家傅雷、“人民艺术家”老舍、诗人闻捷……而罗广斌之死，却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清楚。除去他是否“自杀”一直有争议以外，对于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悲剧结局，也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说他“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罗广斌本人就是造反派），说他是“被江青迫害而死”（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等等。

那么，罗广斌在“文革”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 罗广斌悲剧命运中的“历史问题”

罗广斌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在1949年11月27日那个血腥的日子里就已埋下了祸根。

那一天，人民解放军向重庆挺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正要逃离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留下的命令，对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

这时才25岁的青年共产党员罗广斌，被关押在集中营区内西边的白公馆监狱。这里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当局认定的重要政治犯。自1949年10月底以来，同狱的难友们（有中共党员、民革党员、民盟盟员、“托派”成员等）相继被提出去杀害了。在这最后的恐怖之夜，年轻的罗广斌已成为剩下的十几个难友（大多是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的核心。

半夜里，白公馆的众多特务被调去集中营区西北角上的渣滓洞监狱突击进行大屠杀，急于逃命的特务看守长杨进兴将剩下的16个男犯集中关押到楼下右边2号“修养室”，便带着亲信提前向城里撤退。这时，白公馆只留下了杨钦典一个看守。机敏的罗广斌赶紧劝说这个平时已相处得较好、经难友们作了许多思想工作的看守认清形势，放了他们。杨钦典终于答应让他们逃跑。

罗广斌迅速召集起15个难友，又用杨钦典交出的钥匙上楼去打瞌7 d了单独关押、带着一对小儿女的女难友的房门，共19人，冲出了白公馆。

初冬的寒夜，黎明前浓重的夜色被远处的火光与枪声衬托得十分恐怖，他们跑出不远便被哨兵发现，喝问口令后向他们开了枪。在凄厉的枪声中，他们四散落荒而走。当他们还在草丛乱石里奔逃时，杨进兴却又带着撤退的特务们返回白公馆。看到监房已空，特务们大怒，向四周胡乱放枪……

几天后，罗广斌从重庆郊区藏身的友人家来到已经由解放军接管的城里，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报了到。在这里，他和从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刘德彬等难友会合了。他们一起开始了处理殉难烈士的善后和筹备追悼会、编写烈士事迹等工作。

然而，罗广斌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脱险，竟从此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疑点。原来，在1948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而引起的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开始后，罗广斌随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撤回了成都，躲到了他那官僚地主家庭中避风。其兄罗广文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的嫡系部队中统率17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西南地区特务王徐远举虽然已掌握了罗广斌的行踪，但还不敢随便抓捕罗广斌，特地向罗广文征求意见。罗广文担心其弟在此混乱局势下被一般小特务抓住随便杀了，便不得不同意让徐远举将罗广斌关起来“管教管教”。

因为这样，徐远举既怕杀了罗广斌将来与罗广文见面时交不出人，又怕会因此刺激罗广文投向共产党（罗广文后来还是率军起义了），本来就没有打算杀害罗广斌，并在大屠杀开始后下令释放罗广斌。

到了50年代，随着一批批逃亡特务落网，有关“不杀罗广斌”、“已经决定

释放罗广斌”甚至“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交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安机关的案卷里。这些交待，有的说法相互矛盾，有的只是从个人角度得知的片面情况，显然还不能排除其中会有为减轻罪行而冒认功劳（放了共产党人）或有意制造混乱的因素。

事实上，在大屠杀之夜的紧急、混乱情况下，徐远举虽然下过释放罗广斌的命令，却并未得到执行，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此事。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若是罗广斌没有果断决定自行突围，后果很难设想——同样是已经由徐远举下令释放的两位共产党员：李承林（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和韩子重（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车耀先烈士的女婿），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照样被杀害了……

不过，正因为有了“释放”一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有关方面就对罗广斌这段历史产生了怀疑（持左倾观点的人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共产党人罗广斌与国民党特务的不同说法中，宁可相信特务说的），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由罗广斌组织突围脱险的那十几个难友，以后也大多遭到怀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共产党员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认定他在国民党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出狱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罗广斌的怀疑又加重了。本来先后担任了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市委统战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罗广斌，一直满腔热情地向广大青年宣传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群众反映和社会效果都很好，但是却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长寿湖渔场去担任场长。

生性乐观的罗广斌对此毫无怨言，他一面努力熟悉自己一窍不通的渔场业务，力争干好本职工作，一面尽可能地继续进行宣传革命烈士事迹的讲演和写作工作。

1961年，罗广斌克服了重重困难，依据亲身经历“领衔主创”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地下革命斗争和狱中斗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畅销书，也成为当时最为生动、最具艺术感染力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人生观教材。一时间，报纸连载，电台广播，各剧种改编，拍摄电影……读《红岩》，谈论《红岩》，成了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热点。

正是那个突出阶级斗争主旋律的年代，促成了小说《红岩》的轰动效应。然而，也正是那个阶级斗争主旋律，使得罗广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他一直受到无休止的审查，政治生活受到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小说《红岩》轰动了国内外之后，这种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了。1963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据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原川东地下党干部回忆，胡耀邦为此还不满地说过：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这样革命的小说的人会有问题……当时小说《红岩》在日本读者中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也被有关方面礼貌地回绝了……

#### ◇ 现实问题与历史教训

罗广斌本是一个性情开朗、处事豁达的人。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使他变得深沉起来。他生活在基层，又在经常的宣讲革命烈士事迹和采访写作素材中接触到各方面群众，对一些现实弊端有较多的了解，对一些不正常现象也较为敏感。特别使他感到困惑的是，原在重庆、四川为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忘死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却被一些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另眼相看，排斥打击，甚至来一次政治运动就打下去一批。

在“反右派运动”中，1958年1月，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

随后不久，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在歌乐山集中营里的难友刘德彬又遭到错误处份。刘德彬在渣滓洞大屠杀之夜中弹负伤死里逃生，脱险后与罗广斌一起到处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并和杨益言一起成为罗广斌领导的三人创作小组成员，共同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即《红岩》的初稿），在创作中为塑造江姐这一主要英雄形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在重庆市总工会工作的刘德彬，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份——并且因此被剥夺了继续参加《红岩》后期写作和在《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踵而至。“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1963年4月，又因对当年张文澄批评过的那位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小说《红岩》的写作，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下和廖伯康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此外，在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审查中，萧泽宽也一直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历史，力主尽快给罗广斌作出公正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一贯极左的当权者率先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负责人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马识途和沙汀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给了作者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马识途的被打倒，最令罗广斌震惊。马识途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和马识途本是小同乡，两家有“通家之谊”。抗日战争后期，马识途已是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广斌追随马识途去到昆明，经马识途帮助补习功课，考入了西南联大附中，又在马识途指引下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此由一个富家子弟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进而成为共产党员。小说《红岩》的写作，得到了马识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小说出版后，罗广斌曾在写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你多年的关怀、耽心、喜悦、焦虑……”“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你指引，我将很难走向革命的道路，更没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

马识途被揪出后，他创作的那部与《红岩》题材相同的反映地下斗争生活、歌颂革命先烈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被打成“毒草”批判了……

接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遭到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点名批判为“周扬的追随者”后，被西南局宣布“罢官”。任白戈是支持罗广斌创作的，小说最后定名为《红岩》，就出自任白戈的建议。

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使罗广斌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他的烟抽得更厉害了。

早在重庆解放之初，罗广斌就代表那些已经牺牲的狱中难友，写下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送交重庆解放后建立的中共重庆市委。报告中的内容他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烧灼着他的心。那是他的难友们、烈士们，在临近解放的前夕，明知生还希望已十分渺茫，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总结教训，为使革命事业不再遭受挫折而以血泪凝成的嘱托，是他们集体的政治遗嘱。那时他们相互叮嘱，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向党报告。罗广斌当时并未想到这个报告会由他来承当。自然也更不会想到这个报告会在近半个世纪后像“出土文物”一般由党史工作者从尘封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引起轰动。

罗广斌所写的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份，第七部份是狱中意见，记述了狱中共产党人对党的最后寄语，共有八条，第一条就是希望党“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狱中同志们最为痛心的，就是因几个重要领导干部的叛变而造成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许多人恰恰是被自己所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少数领导人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中，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上的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最后叛变。罗广斌永远记得，同他一样是富家子弟出身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朴烈士，谈到这个问题时沉痛地说过：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现实中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似乎都与某些“上级领导”的错误有关。60年代以来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又促使罗广斌将许多问题放到“反修防修”的角度来思考。

#### ◇ 满怀激情投入“反修”斗争

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所引起的风波，又使罗广斌意外接触到了中共高层领导内的“反修”斗争。

《红岩》改编为电影，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关注和支持，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对电影《红岩》的改编和拍摄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最后还由夏衍亲自执笔修改定稿。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去参加了改编剧本和向摄制组成员讲述烈士事迹、历史背景、生活细节等工作。

但是，当电影《红岩》于1964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已是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和各文艺家协会及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毛泽东批示精神进行“整风”，检查“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可怕错误。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全国各地已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宣部部署陆续开始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等进行声势逼人的大批判。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方面。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修”斗争的高潮正在掀起。罗广斌他们深受感染，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投入到这场斗争中。

这年9月24日，《重庆日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文章详细分析、批判了这部电影的内容后指出，电影《早春二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片”，“企图毒害和腐蚀今天青年的思想，难道这不是为反动阶级梦想的‘和平演变’服务，和社会主义争夺接班人吗？”文章最后指出：“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高地举起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旗帜，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我们自己，发展文

艺批评，发展创作，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更多地提供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作品，在今天是更加迫切必要的了。”

在罗广斌他们看来，小说《红岩》和他们正在筹备写作的《红岩》续篇，正是这种“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作品”，他们充满了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豪感。

1964年11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奉召到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北影厂先已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寄给了他们。到京看了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1月25日向北影厂提交了一份意见提纲《分歧何在》，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20个问题。显然，他们此时因受到文艺整风和对“毒草影片”大批判的影响，而从左倾观点出发，与电影编创人员产生了一些难以调和的分歧。

12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审看了电影《红岩》工作样片，她对影片摄制组成员显得冷漠而高傲，看片中不断以嘲讽的语气提出批评，最后严厉指责影片拍得“太糟了”，并提出“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北影厂摄制组主要成员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汇报了江青对《红岩》样片的批评意见。希望能作一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建国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批判别人的周扬，此时已经被这场可能危及自己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他考虑后提出，《红岩》与那些正在被批判的影片性质不同，可以对影片适当作一些修改，但剧本就不再改了。

这样，影片又经过一番折腾，修改了80多个镜头后送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一审看后，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岩》，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于是影片先被改名为《江姐》，后被定名为《烈火中永生》，不敢再作大张旗鼓的宣传，只作为“一般影片”于1965年夏正式上映。

1965年1月，就是在江青看过《红岩》样片并提出要批判之后不久，她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罗广斌、杨益言。三个月前，他们已从新闻报导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同他们一起观看演出、一起与演员合影的还有毛泽东夫人江青。这次江青是特地请他们去谈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的。与不久前对北影厂摄制组成员的冷峻态度截然不同，江青对两位小说作者十分亲切、热情，她对小说《红岩》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的修改，特别是如何把主要人物江姐写得更加高大完美的意见。她还许诺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红岩》。过后她又请他们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京剧《沙家浜》，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有她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罗广斌感到的自然是来自伟大领袖、来自党的关怀和支持。反对“和平演变”，批判“修正主义”，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党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这样的革命作家的神圣使命。

同那一代革命者中的许多人一样，罗广斌从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真诚地得出一个结论：是毛泽东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对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必须坚信不疑，坚决照办。在刘德彬遭到错误处分，贬到长寿湖渔场作生产队长后，罗广斌就曾对刘德彬说：“对毛主席不能有任何怀疑，你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对毛主席的信仰不坚定。”

——另一位当年地下工作中的战友，此时也被“下放”到渔场作捕鱼队长，一

次听说刘德彬来买鱼，“铁面无私”地吩咐下属：“不卖给他！”多年后，这位老干部回忆起当年情景时感叹说：“那时我们都左得很呀！”

不能理解那一代共产党人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特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许多令今人看来显得不近情理的言行。

时代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内的“修正主义”成为时代主旋律。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当然就是共产党的叛徒。“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的烈士嘱托与“反修防修”的时代使命重合到一起了。罗广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新的斗争。就像堂·吉珂德满怀豪侠之情奋不顾身向他视为魔鬼的风车展开搏斗一样，他和许多热情真诚的人们一样，成了手拿“红宝书”向“修正主义”魔鬼进攻的红色堂·吉珂德……

## ◇ 第二次造反

得到“毛主席党中央”关怀的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感到冰冷的政治压力。他被要求写出在小说《红岩》创作及电影改编中与所谓“黑线人物”关系的交待。马识途被批判后，风声越来越紧。与马识途的《清江壮歌》主题、题材以至作者经历都基本相同的《红岩》，遭受批判已是顺理成章的事。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后，于7月22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继续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批判的绞索已经收紧……

正是在这样多种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下，在前来重庆市文联“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支持下，罗广斌他们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了。罗广斌既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自己解放自己”，更是为了“反修防修”，使当年革命烈士们以生命换来的成果不因领导干部的“变修”而丧失。

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罗广斌却又是因为长期受到左倾错误的压抑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这并非他一个人，而是当时相当一大批与他有着类似遭遇的人的迷误。这真像列宁说过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1966年10月，在重庆及外地来渝红卫兵的共同支持下，罗广斌等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进行了与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的公开辩论。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政治制高点”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工作组当然大败。罗广斌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小说《红岩》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深的，外地到重庆来串连的红卫兵，除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外，往往都要求见到《红岩》作者罗广斌等人，并请他们签名留念。重庆人更将《红岩》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红卫兵“破四旧”更改旧名称时，重庆就有几所中学同时要求改名为“红岩中学”，互不相让，最后只得分别编为红岩一中、红岩二中、红岩三中；甚至还有人提议将重庆市改名为红岩市，将《重庆日报》改名为《红岩日报》……由此可知，《红岩》作者的造反，会引起多么大的震动，给了尚处于劣势的造反派多么大的鼓舞。据当年重庆文艺界造反派一个负责人说，在那次解放碑辩论会后，重庆文艺界的群众大多倒向了造反派。

11月27日，是原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殉难纪念日。往年在这一天，都是由党政领导出面组织举行纪念活动，而在1966年的这个日子里，则是红卫兵、

造反派组织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红卫兵、造反派认定他们才是当年革命先烈的真正继承者，他们今天的造反行动正是为了捍卫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罗广斌作为当年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和殉难烈士们的战友、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更作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作家，被要求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在慷慨激昂的造反歌和“毛主席语录歌”声中，不知罗广斌是否回想起了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运动时如火如荼的场面……

罗广斌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参加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那是他的青春，那是他的新生活的起点。那一段斗争经历无疑对他有着极深的影响。他的一个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谈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是把西南联大时搞学生运动的方法搬到‘文革’中来了。”

#### ◇ 代表造反派上京告状

“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重庆发生，又使罗广斌的造反名声传遍了全国。（见《“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载本刊 z k 0 0 1 1 e ）

在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由于毛泽东、党中央明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时出现了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不纷纷作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给曾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在这种形势下，由党政领导授意建立起来与造反派相对抗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守组织”）便陷入了困境。当时重庆最大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为表示“拥护毛主席、党中央”，不得不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决定也召开批判省、市委错误的大会。

当工人纠察队要在12月4日召开批判大会的消息传开后，造反派普遍认为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决定要去大会造反。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给双方作了不少工作，力劝避免冲突，但未奏效。12月4日，工人纠察队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造反派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双方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

当时局势十分混乱，谣言蜂起，不少“目击者”都言之凿凿地发表文章声称他们亲眼看见“工纠”打死了红卫兵、造反派。罗广斌愤怒地投入到对“一二·四惨案”的凶手和幕后“走资派”的追查和控诉活动中。

“惨案”的第二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到会作了发言，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为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标志着重庆市委与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他在发言的最后高呼：“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

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并自己支付了十几个人的全部车费，去到北京。

12月17日，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出席了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



师大大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首都三司负责人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惨案”的影响。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发言。发言者除去几个首都红卫兵外，只有一个外地代表——重庆造反派代表罗广斌。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罗广斌的发言则是控诉“一二·四惨案”。《首都红卫兵》报的大会报导中概述了罗广斌的发言要点：“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在会上，罗广斌还将有关“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呈交给了周恩来和江青。

#### ◇ 在夺权导致的分裂中死于非命

1967年1月11日，在一片“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喧嚣声中，罗广斌从北京回到重庆，这时他才知道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是他认为正如《十六条》所说的那样，造反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当时的官方传媒一再宣传，对待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正像大革命时期对待湖南农民运动一样，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认为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因此罗广斌仍然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宣传北京的“革命形势”和中央首长对造反派的支持，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大陆各地。各地造反派都因夺权而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或三派。

在重庆，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一批造反派在奉命“支持左派”的驻军支持下于1月24日至26日对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委夺权，随即筹备建立以驻军代表为首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是，对这次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等造反派则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非法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造反派连同在重庆的外地红卫兵公开分裂成为两大派。外地赴渝红卫兵组织中，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站到了革联会一边，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则站到了反革联会一边。

这时，由康生煽动起来的“揪叛徒”风已经刮向全国各地。满腔热情而又不谙世事的红卫兵们充当了“揪叛套b”的急先锋。在重庆，罗广斌成了一个被注意的目标。

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像看不见的“紧箍咒”一般紧紧纠缠着罗广斌，在造反之初，文艺界的“造反司令部”甚至因担心“历史问题复杂”而不敢吸收他这样的

名人加入。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中，“保守派”便以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对造反派进行攻击。而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罗广斌的态度倾向于反对革联会的一派，他的“历史问题”又成为革联会一派攻击的目标。

1967年1月3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题目最初是不肯定的《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但很快就变成了肯定的《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文章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2月5日，一个寒冷、阴暗的日子，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院内，公开绑架了罗广斌。

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宣告其成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公告》的第四条宣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在已经夺权、掌权的一派造反派眼里，罗广斌显然已成为应予镇压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正如罗广斌把“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看作堂·吉珂德眼里的魔鬼风车一样，此时他也被另一派红色堂·吉珂德当作了应予消灭的魔鬼风车了。

同一天，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评大毒草〈红岩〉》。将对罗广斌的批判扩大到了对小说《红岩》的批判。

1967年2月10日，突然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这时罗广斌才42岁，正值盛年。

对罗广斌的死，有几种不同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各种说法都缺少充足的证据。罗广斌之妻胡蜀兴当时被叫去看了现场和罗广斌遗体（但不准她接近遗体），她始终认定现场和罗广斌遗体都被做了手脚。罗广斌究竟是怎样死的，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能令各方面都信服的确凿的答案。尽管“文革”结束后由罗广斌生前友好和有关专家重新调查再次认定是“自杀”，但也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在罗广斌遗物中，一本《毛主席语录》压着一封已经写好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原信被迅速收缴封存。据看到过抄件的人士回忆，信中主要是向“文革旗手”江青汇报了“文革”以来罗广斌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经历。当时所说的大方向，就是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在罗广斌心目中，“党内走资派”自然就是当年狱中难友、革命烈士们留下的血泪嘱托中告诫后人要注意提防的腐化了的领导成员，就是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叛徒。罗广斌死得太早，他还未能看清“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不过，当时能真正看清这场“大革命”真面目的又有几人？

#### ◇ 罗广斌死后的争论和江青的“一锤定音”

在罗广斌死后整整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围绕罗广斌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尽管一派群众组织为罗广斌翻案（连同为“萧、李、廖”及在“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的川东地下党成员翻案）的材料，通过首都红代会中的“地派”及新华社等

渠道不断送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1967年4月初至5月中旬，按照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一系列会议，与罗广斌一起创作小说《红岩》并在“文革”中一起造反的杨益言，获准作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似乎传达了中央对罗广斌态度的某种信息。

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批评了重庆驻军对造反派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作好平反工作。《意见》回避了对重庆夺权后建立的革联会的表态（实际上等于是承认革联会），而提出另行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些都使反革联会一派深受鼓舞。罗广斌的冤案似乎有了平反之望。

然而，在“五一”之夜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将要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出人意外地没有提到《红岩》。在这之后不久，又传出消息：北京京剧团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京剧《山城旭日》已奉命“弃稿不演”，原因是“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又使批判罗广斌的一派增加了信心。

罗广斌不幸身亡后不久，杨益言和刘德彬就在反革联会一派红卫兵、造反派的保护下躲开革联会一派的“通缉”逃到北京，应邀在一些红卫兵集会上控诉“走资派杀害罗广斌”的“反革命阴谋”。他们还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向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等人讲述了罗广斌被绑架、“杀害”及小说《红岩》遭到批判的情况。张羽和萧也牧、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一批老编辑愤然组织了一个保卫《红岩》的战斗队，编辑出版了两期《红岩战报》，其中发表了杨益言的《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控诉、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还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并请来中国青年出版社语文修养最高的一批老编辑一起斟酌文字定稿，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专案调查组名义发表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份）》，以大量材料来推翻强加给罗广斌的“叛徒”罪名。同时，还发表了“文革”前罗广斌、杨益言给北影厂写的《分歧何在？》，以此驳斥“罗广斌是文艺黑线人物”的说法……

但是中央对罗广斌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是无暇顾及，还是另有考虑？

直到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江青才在讲话中明确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至此，江青一锤定音。此后，更多的原四川地下党人被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黑手”……又有一大批人因为所谓“罗广斌叛徒集团案”遭到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之后，这些冤案才得到平反。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罗广斌的所谓“历史问题”至此才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结论。可惜罗广斌再也不能知道这个结论。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因为当初江青要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小说《红岩》，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被两位作者“识破阴谋”予以抵制，江青

恼羞成怒而将罗广斌迫害致死。这一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江青确实向两位作者提出过要修改《红岩》，但并未明确提出过要作者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这样愚蠢可笑的要求。当时在场并不只有两位作者，还有北京京剧团、中宣部的其他人，没有谁听到过这样离奇的要求。当年参加改编京剧《红岩》的作者、空政歌剧团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告诉笔者：后来的京剧改编本按照江青的意见，已经把女主角“江姐”改成了二野部队（即刘邓大军）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甚至连姓都改掉了，根本就不姓江了——这也就更不好说是江青想把江姐改成“江女皇”了。

至于说两位小说作者“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并进行了抵制，以致使江青恼羞成怒而遭到迫害云云，则更不知从何说起。

两位作者在江青接见后，被要求留下来参加修改京剧《红岩》，江青还交待，以后就按改好的京剧本修改小说。两位作者被安排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受江青委托，将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京剧《红岩》的40名演员带去重庆体验生活，住渣子洞，上华蓥山。1965年4月到重庆后，据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

罗广斌当年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十分郑重其事而又满腔热情地向市委及宣传、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人，还向到重庆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汇报了江青在京接见时所谈意见，那时完全是当作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宝贵意见来汇报、传达的。当时听过汇报、传达的老同志，如今健在者尚有不少，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识破阴谋”的影子？

如果说罗广斌是因江青“恼羞成怒”而被迫害致死的话，那么，在罗广斌身亡、小说《红岩》已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猛烈批判之后，同他一起创作《红岩》并一起在“文革”中造反的杨益言，怎么还可能获准作为一派造反派代表（名单显然要经过江青批准）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

把罗广斌的死说成是“受江青迫害”显然是不准确的。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当初批判和绑架罗广斌的一派群众组织得到过江青的授意，而且可以断定不会有这样的授意，否则就很难解释：当时同样是“中央文革铁拳头”，同样听命于江青的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为什么“天派”的北航红旗会率先批判罗广斌，而“地派”的地院东方红却又一直为罗广斌辩护、翻案？

实际上，当时群众组织的许多作法，都是在左倾思想误导下，在“史无前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群众首创精神”而自发产生的。

江青只是在罗广斌死去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才发表了“鞭尸”式的讲话。把这个讲话当成罗广斌致死的前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江青讲话中所谓“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的说法，也并非她的发明。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的领导骨干们，早已在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思想左倾的领导人一批批打下去，成了“土匪”、“右派”、“反革命”……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之一的陈联诗，在解放初期就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勒令“退党”……

罗广斌的悲剧，不应看成是个别邪恶人物的罪过。这是一个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时代悲剧。

所幸的是，这个悲剧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  
【往事追忆】

我的造反生涯  
• 徐友渔 •

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串联之后回到成都，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

在北京时，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革”运动的总结。他在其中讲“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把1966年8月份以来流行的“自来红”思想和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划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指出，这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腐朽透顶的思想的翻版，是血统论。他还指出，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就是在“文革”运动中制造混乱，提倡这些荒谬论点的人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学习了陈伯达的讲话，觉得头脑豁然开朗了。原来流行的那些令自己反感的東西，那些毫不讲道理的东西，果然是错的！而且，制造谬论的人是为了压制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回成都后，得到了陈伯达讲话的铅印本，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我们这时深切体会到了，为什么报纸上常常强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原来，那些吓人的革命口号，那些左得可怕的东西，并不是毛主席支持的。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感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此亲切。

我和M从陈伯达的讲话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提出对联（这时已被称为“反动对联”了，形势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轻学生固然有错，但血统论（这时也被称为“反动血统论”）之所以那么狂飙，流毒如此之广，原因恐怕在于有掌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文革”运动。因此，清算“文革”中的反动路线不应该向同学翻旧账，而应该挖出根子。我们两人到处奔走，到西南局、省委、市委去看大字报（这时形势已经大变，各级党委中的党员和干部纷纷造反，揭发当权派的问题），同时找原工作组的负责人和队员了解情况。我们果然掌握了大量材料，说明西南局、省市委中某些人暗中大力支持散布和推广血统论。我们写了一份长长的文章，油印散发，公布了我们的结论。

一天，M拉我去成都北郊的一个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他串连到成都，作煽风点火宣传，即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他在成都已经作了很多场讲演，唤起成千上万的人起来造反。他在成都名气很大，深受工人拥戴。

我本来并不特别重视他的讲演，但很快地，我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与我预料的相反，他并不讲理论和当时流行的大道理，而是用极其普通的语言，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一件件事情入手，揭示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存在的毛病。根本问题在于，现在制度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使得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压制群众。他们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以阶级斗争为幌子，动辄就把给他们提意见的人，与他们有利害冲突的人，他们看不惯的人打成反革命。一个人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而被当权者在档案中记上一笔，从此就永远不得翻身，每次运动一来就首当其冲，成为靶子，多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举了大量的例子，这些事例都从工厂、学校实际生活中得来，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它们是

真实的。他向听众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生活这样的条件下，还能说在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吗？那些当官做老爷，整人害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难道是人民的公仆吗？

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参加听讲的人越来越多。我周围的工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们最后绝对听讲演者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

如果说，陈伯达的讲话使我对“文革”开始以来几个月中种种疑惑有了清楚的认识，那么可以说这次讲演使我对于十多年来生活中种种难于解释的事情有了明确答案。多年来，我们被告知，中国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但现实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被告知，党是绝对正确的，但人们看到有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却在玷污着党。人们从经验中直觉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但有些领导人以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宣传机器让人们相信，错误不在现实生活中，而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对现实的批评、怀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在作怪，应该改变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认识。人们多年来一直以党的权威和革命理论来抗拒生活经验，甚至抗拒自己的亲身遭遇。现在，这一层纸一下就给捅破了。原来事情如此！其实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锁一旦去掉，人们的良知、价值标准和经验事实马上一致起来。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怀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骗的结果。人民要真正做人，这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的真理。在当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被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一点。自运动开始以来，工作组在群众面前表演得十分充份。他们和单位的党委沆瀣一气，整群众的黑材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他严厉警告说，凡是镇压群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66年底，各单位都传达了中央一个规定，该规定同意中央军委前不久发出的一项紧急指示，要求对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学生一律平反，整他们的黑材料一律当众销毁。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深切体会到，在把保护群众、支持群众的种种做法归功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我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将与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弥合。我的理想将通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实现，在党的这种新形像面前，以前的困惑和疑虑统统都扫除干净了。

看起来，参加革命造反不但势在必行，而且义不容辞。但在串连回成都之后，我发现革命造反派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正在激烈展开宣传攻势，争取人心。我选择哪一派的组织呢？

成都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紧紧依附于大学生红卫兵。每个大学都在中学发展自己的势力。成都市原来有一个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由成都市十多所大学中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即反工作组的学生串连在一起组成。随着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红卫兵势力越来越小，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但是在1966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发生了分裂。

这就是成都地区“文革”史上著名的“一一·一三”造反事件。原统一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11月13日开一个批判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而官方也希望有一个场合让李公开检讨认错，不然他会被说成是坚持错误，对抗运动。于是在政府协助配合下，批判大会如期举行。但会议正在进行时，这个组织的川大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一些人却突然冲击主席台，使大会无法进行下去。他们说这个大会让李登台亮相，实际上起到了假批判、真包庇的作用。他们造了

“一一·一三”大会的反，而其他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则谴责他们的破坏和分裂行动。从此成都地区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川大“八·二六”，另一派是除川大之外的所有大学，仍然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一般人的印象是，川大“八·二六”的政治倾向更激进，而“红成”则稳妥和温和一些。

我不喜欢“八·二六”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见，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著名格言概括其基本精神：“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尽管当时四川和成都地区保守派已经式微，从西南局、省市委到各级领导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其主要负责人被认为是黑帮，正急于检讨和自我批判，但这一派仍然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继续把局势搞乱。他们认为四川还没有乱够，没有乱透，只有透底烂掉，最后才会有好结果。而任何温和的、按部就班的方针都是右倾、调和、搞折衷。当然，我在选择组织时还是十分慎重的。我到各个大学去了解每一个组织的观点。当我去川大时，刚巧那个负责接待的人水平不高，而且有一个“红成”派的人正在巧妙地法难他。他穷于应付，张口结舌，漏洞百出，我对他所属的组织印象不佳。大致就在这时，我作出了选择。

正巧，我的同班老友L来拉我参加本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旗野战兵团”（简称“红野”），他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可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宜作负责人而辞去勤务组（那时为了表示与旧体制划清界线，并表示领导只不过是群众的勤务员，任何组织的领导班子都称为勤务组）内职务，但仍保持在该组织中的元老地位。“红野”与我校其他造反派组织不同，它与大学红卫兵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观点倾向于“红成”，但其中有不少人也倾向于“八·二六”。我对这个组织比较中意，就决定参加。该组织第一号勤务员M对我表示欢迎。并举行了一个宣貌7 d 仪式，我就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了。

我校有一个川大“八·二六”的分团，其核心就是在写信事件中最早造反的那批同学。他们“文革”前基本上是团干部和班干部，又有最早反省市委、受工作组打击的光荣历史，因此自视甚高。与保守派固然势不两立，对其他人也看不上眼，大概认为别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惟独自己最革命，他们一直甘当光荣的少数。不论从理论取向上还是从人际关系考虑，我都不会参加这个组织。

大约在1967年初，我的好友X（与之进行人生观论战的那位小学同学）叫我和M去参加一个中学生的串连会。会议发起人是H（他后来成了名人），一个和我们同年的中学生。他正在办一份铅印报纸《中学红卫兵》，近期目的是批判血统论。第一期已经出版，主要内容是转载北京遇罗克的轰动一时的文章“出身论”。这篇文章写得极好，立论严密，文采飞扬，说理透彻。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由同龄人写出，引起我佩服的文章。H为他办的报刊写了一个发刊词，也写得很好，思路清晰，文锋犀利。他邀请与会者和他共同办好那张报纸，我欣然同意。

但是，M偷偷拉我到一边去，劝告我应对此事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办报纸是件非同小可之事，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重大问题发表见解，还没有把握。万一犯了错误，后果就严重了，因为一张报纸会有许多人阅读。我们只应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办报这种有深远社会影响的事情，应三思而后行。我又被他说服了，我们把H叫到一边，对他讲了一番社会责任、社会后果之类的道理，并表示了我们的保留态度。H倒很宽容，没有表示失望，也没有勉强我们。

这是又一次，我追随了一种肤浅的主张。M确实比较胆小怕事，另外，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但对理论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我后来从H的报纸和X借给我的材料中，读了遇罗克的所有文章。

X家庭出身并不差，他决不是为了实际目的才喜欢遇罗克的文章。他后来专程去北京，想拜见遇罗克。但遇罗克已经被捕，他们的报纸被查封，编辑部被洗劫。X在北京认识了遇罗克的一些朋友，了解到许多详细情况。他告诉我们，遇罗克是一个比我们几岁的青年工人，他在学校时学习、品行极为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考不上大学。他勤奋自学，平时在门上贴一纸条：“来访者谈话不得超过10分钟。”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刻苦，他终于在历史和文学方面达到博古通今的水平。他胸怀大志，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血统论猖獗之时，他发表了“出身论”、“填鸿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受到北京市的学生和工人的热烈欢迎，为大家争相传诵。这些文章还流传到全国各地，人们认为它们说出了自己久已想说而不敢说，或说不清楚的话。遇罗克勇敢地 and 血统论者辩论，那些人辩不过他，就大打出手，靠封别人的口来掩盖自己理屈词穷的窘态。X还告诉我们，“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等人曾宣称遇罗克的文章是“反动的”，攻击了党的阶级路线。他被判处死刑，除了因为写文章批判血统论，他的日记也成了定罪的依据。遇罗克是“文革”中为真理而献身的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他的死是我重新思考“文革”和现实政治体制的一个动因。

#### ◇ 理论家

我在战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和我能写大块头文章，与“八·二六”派进行论战有关。

“红成”和“八·二六”的分裂，虽然起因于对一次批判李井泉大会的不同态度，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显示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对形势的估计，对运动最终目的的理解，对中央战略部署的执行，等等。双方都攻击对方是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执行革命路线。“红成”的头头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想和对方进行一场论战，以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但除了一些大学中个别战斗队有零星文章涉及这一题目，长时间未见正面论述理论分歧的重要文章。

我决定自己来做这一工作。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和“红成”总部头头有不同意见，但在思想理论上，我完全赞同“红成”的思潮。我决心做这种思潮的捍卫者、代言人。

我虽然对“八·二六”的主张相当熟悉，但仍然仔细研究了他们自运动以来发表的所有重要文章，包括他们对于四川和成都地区运动形势的声明。我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写出一篇论战性长文，叫人油印成大型传单，在成都市广为张贴。文章的题目早已忘了，根据那个时代的时髦，很可能是“我们对于时局的若干看法”，或者“我们与川大‘八·二六’的根本分歧”。我在文章中抨击“八·二六”的主要方面，是说他们从不按中央关于运动的战略部署办事。所谓战略部署，在“文革”中是一个极其重要、广泛流行的概念。它指中央针对运动的某个特定阶段而颁发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不言而喻，红卫兵组织应该拥护文化大革命，力争实现运动的最终目标，但这还不够，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实现运动的最后目标，中央要求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任意行动，我们要服从中央的解释、要求、规定。总之，中央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坚决干什么，中央未叫我们干的事就不要去干。我们不应该自行提出革命任务和口号，不能发出和中央号令不协调的声音。这就叫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文革”中，这是对红卫兵最重要的要求之一。“红成”自视为最纯正的革命派，他们宣称自己总是尽全力学习中央文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力争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央的步调。而“红成”认为“八·二六”从来都不是这样，这是两派区别和分歧的根本所在。

我在文章中从以下几方面批评“八·二六”。（一）他们从来不认真执行中央



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军工厂，不搞武斗，等等；（二）他们从不贯彻党中央在每一阶段提出的中心任务，而是自己另提口号，另搞一套，比如中央号召大联合，他们却鼓吹分裂（他们当然要说得冠冕堂皇，叫做“与机会主义路线决裂”），鼓吹四 i l l 乱得不够，还要大乱；（三）他们鼓吹和执行一套极左的东西，比如中央肯定干部的大多数，保守组织中的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但他们把四川所有的干部都看成黑线人物，把保守组织“产业军”称为“产匪”。我把他们的方针和理论归结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倾机会主义，说他们不愿意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耐烦对群众做长期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而是提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方针，企图轻而易举地赢得群众支持。

我在文章中进而提出，“红成”和“八·二六”的分歧与争论，是革命派内部两种思潮和倾向的斗争，在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坚持与以“八·二六”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写这种长篇理论文章，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文革”之前，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的路线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论战，中共写出了一系列洋洋洒洒的论战性文章，这种文章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除了使我们坚信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正在挽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还激起了我们巨大的理论兴趣。文章的形式、风格、语言对我们也影响甚深，在“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文章大多数是一种模仿。学生中爱思考，喜好理论的人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以及国际共运史。毛泽东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论战，对我们已是耳熟能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小册子中的论战内容和论战风格，为我们津津乐道，学习仿效。按照共产国际、共产党内部理论斗争的模式，红卫兵理论家动辄就给对手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动辄就要进行两条路线的论战。善打“内战”，这是红卫兵理论家的共同特点。

“红成”派头头和许多战士在“文革”中一直有一种委屈和抱怨情绪，他们认为对自己忠诚不渝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八·二六”则任意乱来，但到头来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中央文革”明显偏袒对方。他们一直想不通，觉得是老实人吃亏。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发表在党的中央全会决议中的政策，那些文件中的规定以及社论中的号召，其实许多都是中央高层斗争的妥协产物。毛和“中央文革”实际上心中另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并没有把纸面上的东西当成一回事，正是他们带头不照章办事。问题的实质是，所谓的“中央”并不是一个统一体。“红成”所遵奉的，乃是一些表面文章。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正要求于群众组织的，并不是要坚守某些原则和政策，而是要跟人。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一个组织，是凭着按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行事而取得胜利的。

“红成”总部头头对我写的理论文章颇为欣赏，甚至提出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以“占领理论阵地”。但此事也只是议而不决，而我也对留在总部工作不感兴趣。

我后来发现，我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难以为继。我认为对方并不严肃认真地探讨革命理论，而是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写一些东西蛊惑人心。比如川大“一一·一三战斗队”写了一篇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我不但不同意其内容，连标题也很反感，成都怎么会“爆炸”？真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我经常为这类文章愤怒，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喜欢这类有刺激性的东西。眼看舆论阵地一天天被“八·二六”占领，我心中十分焦急。后来，有人对我说，不得已时只能以毒攻毒，建议我也用他们那种笔调写文章，以扭转舆论。我想试试也无妨，就写了一篇题目有针对性的大字报，叫“拯救成都”。我在文章中预言成都即将发生大规模武斗，呼吁大家提高警惕，预先防止。我这个预言当然是对的。

，过了不久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我的文章不过是力图抢先一步，要对方承担挑起武斗的责任。这份大字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引起了各种人的议论。不少人，包括离成都很远的人，都到我校来索取油印传单，大家十分得意。同学们常常夜以继日地抄写和刻印我写的文章，很长时间，这是战团的主要事情。我后来又写过不少类似东西，语言竭尽夸张之能事，抓到一些零星事实就凭想象去发挥，尽量使文章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这种文章很成功，但我却暗中感到悲哀，为什么严肃认真的探讨就无人理睬呢？我的东西轰动一时，不过是为本派取得宣传效果罢了。我宁愿继续当理论家，而不愿意当这种宣传家和鼓动家。

现实就是这样令人沮丧，肤浅的东西总是大行其道，我不能老是去和对方比蛊惑煽动的本领。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导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气愤之下，我决心认真对付他。我先到川师去摸他的底细，“红成”的人自然说他坏话。他们告诉我，此人极为狂妄，自称是思想上的拿破仑，说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他成功后，每天广播时有人在旁边为他打扇，尽心侍候他，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我派了一个忠诚可靠的下属，在他的广播站对面找了一个房间，每天晚7点记录他的广播，准备以后在理论上与他算总账。我这个下属极为勤勉可靠，几个月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每天返校交给我一厚沓记录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并未派上用场，因为形势变了，文斗变成了武斗。

~~~~~

【研究评论】

徐友渔的红卫兵研究

• 王鹏令 •

在中国大陆，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还受到种种限制甚至压制，对文革的真正理性的深入反思，可以说到现在还几乎没有开始。相反，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伴随着“崇毛热”的升温，基于对官员腐败和严重社会不公的不满，一种对文革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怀旧情绪，已经在某些知识分子群落和弱势阶层中逐步滋长蔓延开来。而在这其间扮演要角、主角的，有许多即是来自当年的红卫兵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这种颇给人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之感的现象，很自然地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友徐友渔先生不避艰难和风险，潜心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凡四年，终于成就了一部力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以下简称《形》，引文只注明页码）。这本书于不久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认为，这是目前已出版的“文革学”著作中最好的一本。笔者读后对此深有同感。

其实这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全书正文总共不过262页，分作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作者此项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得出的主要结论；其余五章则分别从“文革前的教育”、“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造反的原因”、“幻灭和觉醒”以及文革的“后果”等各个方面，几近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一、红卫兵也是“红军”

究竟谁是“红卫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意涵可能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就以当年的“老红卫兵”（亦称“老兵”）和与之对立的“造反派”学生为例：在多数中共老干部的眼里，前者是他们自己的子弟，而后者如果不能被打入“另册”，至少也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两者自然是分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但在那些被各派红卫兵视为共同敌人的“黑五类”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记忆中，两者恐怕是一丘之貉！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伙人当中的若干“死硬派”分子，至今仍然严守着彼此之间当初的政治分野，他们自然不会在“红卫兵”这面大旗下互相认同。

徐友渔先生的专长在分析哲学，他知道“红卫兵”的本来意义，只有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得以确立的具体情境，并在尽可能尊重当时人们的习惯用法的条件下，才可能加以合理的确定。“红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并不是由毛泽东所首创，但是自毛公开地对“红卫兵”加以肯定和支持以后，“红卫兵”事实上已成为文革期间所有“革命学生”及其组织所共有的一种身份符号；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衡量一个学生是否“革命”，就看他是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作者“把所有投入文革的学生都称为红卫兵”（第4页）。对“红卫兵”的这一简单而明确的界定，突显了当时中国学生普遍共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历来把知识分子摆在革命附庸地位的毛，此时已经不得不借助青年学生为他发动的文革扫清道路、打开局面。

毛在晚年毫不讳言，对于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当然主要是指昔日那些曾经跟随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老红军和老干部，其实他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曾扬言“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且不说老式红军已再也找不回来，即便可以找到，“泥腿子”队伍又怎么搞得了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但毛找到了“红卫兵”！红卫兵也就是他曾不止一次地扬言要寻找的那支“拿起笔作刀枪”，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新红军”。

这是一支识文断字、总数大约一千万到三千万人的庞大队伍（第4页）。这一代人，包括其中年龄最大的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在内，全都是中共建政以后走进校门的。如果说，四九年以前受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原则上只是中共需要加以“团结、改造和利用”的“异己”或“另类”、五十年代受教育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也不够“纯正”，那么“红卫兵”一代则是由中共自己培养，“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数千万青年学生成为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和对毛死忠的一支先锋力量，在毛实不过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已。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本来就是毛思想的“嫡生子”。事实上，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把“造反”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但誓死捍卫毛和毛的革命路线，却是造反派始终不渝的基本政治立场。正如《形》所说，“文革中不论哪一个时期的造反派，都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第70页）！笔者以为，对于红卫兵一代来说，今天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当初这种基本的政治“选择”，甚至编造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说法（详下）以或明或暗地否认之，则所谓对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的反思也就无从谈起。

徐友渔先生当年也是红卫兵，而且是造反派红卫兵，但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这便使得他个人的文革经验合理地转变为一种资源优势。

## 二、拆毁“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

任何一代人都会留恋自己的青年时代，红卫兵一代今天对自己昔日曾无限迷恋的种种偶像，也难免心存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因而这些昔日的偶像，不论是人格的或观念的，也都有可能依然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供奉着，只不过可能已经

变了形式，换了包装，亦即改建了“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诗人黄翔语）而已。

《形》对当前在红卫兵一代人中颇流行的若干莫名其妙的观念的剖析和批评，正是为了拆毁这类“庙宇”。

作者指出，“文革后，前红卫兵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宣称他们当年的行为纯粹出于理想主义，出于革命热情”（第31页），这个遁词的背后似乎是说，不管当年红卫兵的言行是何等疯狂和不可理喻，但其“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毕竟体现了“纯洁”、“崇高”的价值。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你如果简单地否定它，就很容易被误解或诬指为否定一切理想主义，否定一切革命；而如果你默认它，那么你实际上也就很难拒绝红卫兵所代表或象征的那种特定的精神传统。

徐友渔先生对这个陷阱是有警惕的。他承认，当年的红卫兵“出于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而造反，“这种情况对于许多人而言也许是真的”，但是作者提醒人们，红卫兵一代是在完全封闭和压抑个性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理想并不是来自个人自主自由的选择，而主要是官方强制性的、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而官方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实在是一种“野蛮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红卫兵一代在文革前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毛式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作者通过回顾和分析文革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本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以蒙昧无知为基础、内容上空想和手段上野蛮，以及思想和行为上倾向盲目破坏等等，乃是这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者接着设问：“这种革命理想到底是甚么呢？它提倡的绝对忠诚，是对人民和民族，还是对最高元首个人？它鼓励的无情斗争，是对社会和民族的敌人，还是本应受到敬重和爱护的人？”（第31页）答案十分明确：“文革中红卫兵在精神上依靠的，行动上捍卫的，不是一般的革命理想和目标，而是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们还认为，由于本派本组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捍卫了这种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路线，因此应当受封为‘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权力分配中占最大份额。”（第17页）足见当初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并非排除任何利益考虑，只不过是献身于革命首先获得政治权力，进而在极权体制中自然地获得其他各种利益。一句话，当年红卫兵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的附庸，既是那种极权主义的产物和要求，又反过来为极权主义服务。这是红卫兵运动与德国法西斯的纳粹青年运动十分相似之处。

所谓“人民文革”，也是一种颇流行的观点，逻辑上明显是与关于文革的“社会冲突论”解释一致的，似乎是沿着民粹主义的方向对后者的进一步夸张，夸张成“神话”了。对此，《形》的第四章做出了在笔者看来相当有说服力的批驳，因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评述。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卫兵一代中的某些文化人对当年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人民文革”的鼓吹，到世纪末似已在中国大陆的文化舞台上汇合为一场“大戏”：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话剧《切·格瓦拉》的相继推出和炒作，在思想倾向和精神风貌上，不是与被左派们包装美化了的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一脉相承的吗？

### 三、实证功夫

《形》对红卫兵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是在反思毛时代这一大视野的背景下进行的，然而通读全书可知，《形》丝毫没有“宏大叙事”通常所带有的那种抽象空洞的弊病，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得益于作者对实证方法的高度重视和善加运用。

文革的原始文献是《形》所依据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之一。作者不仅在浩如烟海的文革资料中，选择了“当年红卫兵的出版物”，作为自己“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材料”；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到许多城镇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包括座

谈、讨论及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的“田野调查”，仅其正式的个别采访对象即多达一百多人——这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外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其次，作者对采访对象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务求其具有“地域的广泛性”以及“年龄层次”和“组织派别”的代表性。可以说，《形》在调查对象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代表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此前任何一本文革研究著作都无法相比的。

自觉地把自己的此项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第13页），并以批判的眼光和对话的方式来借鉴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是《形》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中国其他文革研究者的一个特点，由此《形》与其他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展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形》在学术上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更全面、更细致地揭示了红卫兵运动的内在差别，并在此基础上，以详述（典型案例，包括四川、广东和湖北）与概览（其他省区）相结合的方式，为省一级水平上的红卫兵派别斗争描绘出一幅全景式的画卷，从而不仅纠正了以往相关著作对历史描述的偏差，补充了其叙述的不足；而且还由此出发，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共高层斗争、当地驻军的政治状况与造反派分裂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当年造反派内部“激进”与“温和”两派斗争之外部政治动因、内在思想根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基础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第三章）。作者认为，在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以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直至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究其根源有三：其一，刘邓被打倒后，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其二，军队在文革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军队也不如以前人们想象得那么统一，分属于不同山头、不同派别的各地驻军，往往有其不同的利益；其三，一致支持文革的造反派红卫兵，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之分，而这种差别则是基于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很明显，作者依据大量实证资料提出的这些见解，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红卫兵运动的真相，而且对于人们认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也是有启发的。

就史识而言，作者不乏理论勇气，不仅敢于突破官方的政治教条，而且几乎在每一章每一节，都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过在笔者看来，《形》也存在着若干明显的不足和缺陷。这首先表现在作者虽然批评了“社会冲突论”，但没有对文革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由于红卫兵是文革的先锋，在许多地区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发挥了领导社会的作用，如果不阐明红卫兵运动与整个文革解释模式之间的关系，则对红卫兵运动的解释就不仅缺乏完整性，而且可能隐藏着不合理的因素。我想，这无论如何都是作者应当尽快弥补的一个方面。此外，笔者觉得，第六章、特别是第五节“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后的民主运动”，显得有些薄弱。比如，作者肯定了红卫兵一代民主意识的发生，却基本没有对其发生的机理和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与此相应，作者在讲述代际差别时，对红卫兵一代、尤其是对“老三届”的评价似乎偏高，不怎么令人信服。在方法上，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文革，但作者似也流露出某种对这些理论一概加以拒绝的意思。如果真是如此，我看是值得重新考虑的。就以毛与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为例，若以笔者之见，借用韦伯的“奇理斯玛型支配”来解释，即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笔者相信，在西方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或学说中，必定还有不少可资研究文革的借鉴的资源。

□ 原载《民主中国》二〇〇〇年九月号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